

百越研究

【第四辑】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吴春明 蓝达居 何 斌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百越研究

【第四辑】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编

吴春明 蓝达居 何 斌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越研究. 第4辑/吴春明, 蓝达居, 何斌主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15-5919-2

I. ①百… II. ①吴…②蓝…③何… III. ①百越-民族历史-中国-文集②百越-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22667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章木良
装帧设计 蒋卓群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5.5
字数 600 千字
印数 1~1 200 册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目 录

族群源流

1.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

——兼探虎方之地望…………… 郭静云(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1

2. 岭南总名陆梁出自越语说新证…………… 周运中(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8

3. 百越民族考古学文化考证瑶族千家洞在灌阳

——瑶族千家洞问题研究之九…………… 盘立(广西桂林靖江王陵博物馆) 35
盘福东(广西桂林博物馆)

4. 南越国内的汉越文化融合例证…………… 张启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46

5. 略论闽越族与南岛语族的关系…………… 朱燕英(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57

6. 以吴简为例看叛逃人口与山越关系…………… 张玉林(广西防城港市博物馆)63

7. 六朝时期东南地区族群关系综说…………… 林校生(福建宁德师范学院畬族文化研究所)69

8. 从考古资料探讨黎族族源…………… 郝思德(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黄兆雪(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博物馆)81

9. 试论黎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 高泽强(海南三亚琼州学院)92

10. 瓯越名城温州历史上的王国、开拓、海防…………… 龚剑锋、宋文彝(浙江师范大学)100

11. 再论木佬即仡佬…………… 吴国富(广西民族大学) 陈明君(云南大学)108

12. 畬民最早入迁景宁时间辨析

——雷进裕等人于明万历年间而非唐永泰二年
迁入景宁…………… 雷必贵(厦门大学人文学院)119

文化内涵

13. 华南“洞穴人家”的文化性质 佟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30
14. 汉至南朝岭南地区的陆路交通工具 蒋廷瑜(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143
15. 瘴疠保护西瓯、骆越人及其后裔得以存在繁衍 范宏贵(广西民族大学)152
16. 从口头传统看侗台语族的鳄崇拜及其
遗存 李斯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158
17. 试析侗族龙纹饰的文化内涵及造型艺术 周羽(广西桂林博物馆)168
18. 壮族山歌当下的生境与传承现状
——以桂西那贯屯的田野调查为例 平锋(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177
19. “道体”师用:广西上林县西燕壮族师公
《大斋请圣科》分析 覃延佳(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186
20. 试析黎族有关文身的神话、传说与歌谣 王献军(海南师范大学)194
21. 从文化边缘到耕读传家
——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的历史抗争 王道(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院)204
22. 桂林宋代“判隅知寨碑”初探 蓝冰(广西临桂县文物管理所)217
23. “苗图”浅议 干小莉(云南民族大学)225

考古研究

24. 海南岛昌化江流域史前文化及相关问题 何国俊(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31
25. 台湾海峡两岸史前聚落的扩张和海洋适应 程玲(福建厦门市博物馆)240
26. 马岭文化的初步分析 黄运明(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252

27. 浅论闽西山地的浮滨文化

——以长汀河田镇羸坪、山塘坑遗址墓葬

资料为中心 张闻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范雪春、王芳、危长福(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273

28. 浮滨文化玉(石)器中的夏商因素 石荣传(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86

29. 广东横岭山墓地墓葬布局初探 游晓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99

30. 试论广西古代崖洞葬中的独木棺 彭书琳(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310

31. 湘北地区商至西周时期的器物模仿现象

——兼谈早期越式鼎的出现背景 盛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23

32. 越国贵族墓葬的文化因素与文化性质 葛琮源、曹峻(上海大学历史系)333

33. 华南秦汉越人窄坑墓 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344

34. 越南Mán Bạc陶鼓刍议 卢智基(香港中文大学)358

35. 百越“乐制”初探 付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366

36. 闽北六朝墓葬与族群变迁

——以建瓯东峰六朝墓葬为例 王新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376

37. 东南地区六朝墓葬中的越文化因素 刘中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390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

——兼探虎方之地望

郭静云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过去,我们时常习惯在讨论虎的概念时,将其视为象征“西方”的神兽(白虎形象),但将老虎作为西方象征的概念,其形成时间很晚,往往不足以代表上古文明崇拜神虎之多元性意义。笔者研究老虎形象来源之后得出推论:古人崇拜老虎之文化发祥地可能有两个:江汉上游西岭、长江中游江南山脉、东北山脉。此三个地区原本皆各自有独特的虎崇拜传统,但由于族群交流、文化的传播,因而在历史上发生了混合、互补及演化的现象。其中最古老的拜虎传统,是源自蜿蜒逶迤的江南山脉。本文拟从零散的考古资料,以及出土和传世文献资料,试图复原江南地区这个拜虎大文明的形貌。

一、从虎形的礼器讨论江南地区崇拜神虎的信仰要点

在华南的山岳森林中,过去也有老虎出没(属华南虎,学名 *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在古代,其生活范围是从南岭到湘鄂西的山岭、北至陕东南的山林,与西南的先民交界。华南类型的虎形礼器如石家河玉器虎头(图 1:1—3)^①、凌家滩双首虎玉器(图 1:4—6)^②;吴城遗址的青铜器,如扁圆龙足虎鼎(图 2:2;3:1)、伏鸟双尾虎(图 3:2)、虎首戈(图 2:1)^③等;三星堆和安徽阜南县朱寨镇遗址发现的铜尊亦属华南类型(图 4—6)^④。这些礼器,都揭示了江南先民对虎的崇敬,这应是源于他们自生活中接触华南虎的经验而产生的信仰。

笔者推论:江南文明中对神虎的崇拜,源自武陵山、雪峰山、罗霄山和南岭脚下的先民,且在中国境内属于发源最早的拜虎传统,后来发展到达江南平原地区,影响长江中游

① 参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0~95页,图63—78。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59~60页,图57—59。

③ 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江西新干出土青铜艺术:长江中游青铜王国》,香港:两木出版社,1994年,图版6—9;38;40。

④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5~36页。

大文明的信仰。凌家滩、石家河已属十分成熟的文明,都曾出现虎头的礼器,这使得笔者推测:江南岭北地区崇拜虎形象的传统,可能拥有比石家河、凌家滩更早的来源。但若从现有的早期文化遗物来看,目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线索还是十分零散且不够明确。

在新石器早期的文化中,湖南省的西南区——洪江高庙祭祀场所遗址内,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兽骨,这代表着此处应居住着山岭附近的上古猎人群,而他们在此丘陵台地上曾举行过祭祀活动^①。在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兽骨中,较为突显的是野猪和老虎的骨头^②。高庙下层祭祀坑中并发现过完整的猪头骨,以及几具男性头骨与鹿角和野猪下颞骨合葬。高庙遗址下层两次发掘的成果,年代测试在距今 7200—6700 年间(未校正的数据),陶器的器形与澧阳平原年代相符稍为早的胡家屋场遗址接近^③。近十几年内,湖南中、南部的丘陵和山地亦发现了数座高庙文化遗址,如桂阳千家坪、长沙南托大塘、辰溪征溪口和松溪口贝丘遗址,后者的年代测试在距今 6500—6000 年间(未校正的数据)^④,都应属于新石器早期狩猎、渔猎族群的聚落和祭祀场地。

湖南中、南部地貌是错综复杂的山林、河谷地区,在本地新石器中期白陶和红陶上,明显可以看到山水形状的刻纹(图 7:4、5)^⑤,表现出本地先民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与理解。在桂阳千家坪遗址的刻纹陶上,这类的“风景”图甚多,包含了山水及树木的图案。自然条件和文化遗物,都显示了狩猎族群的活动情况。在松溪口遗址所发现、具有神秘意义的白陶礼器上,可见类似猛兽的造型,如白陶盘外壁的图案,则像是一双猛兽对立而从口中拉出一条线的样子,由于这件礼器有所残缺,因此线的形状并不清楚,但在其上一层可见有一行山岭,而下层刻纹的意味尚不明朗(图 7:6)^⑥。不过,在这件陶器上的一双猛兽,相当近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像开旺:《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4 期,第 4~23 页;贺刚:《高庙遗址的发掘与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馆》2005 年第 2 期,第 113~124 页+图版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 年第 7 期,第 9~15、99~100 页。

② 笔者感谢湖南考古研究所提供相关资料,详细考古报告待刊。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向开旺:《湖南黔阳县高庙遗址发掘简报》,第 4~23 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第 9~15、99~100 页。

④ 千家坪遗址资料尚未公布,感谢湖南考古研究所提供完整之地料。其他参:长沙市博物馆、黄网正、王立华:《长沙南托大塘遗址发掘报告》,《湖南考古集刊》第 8 集,2009 年,第 17~27 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征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6 期,第 17~27 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6 期,第 4~16 页。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第 10~11 页,图九:5、十:5。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第 11 页,图十:1。

似于猛虎的造型。^①

同时,在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含有神秘意义的白陶礼器上,最容易辨识且常见的刻纹图案主要有两种:鸟头图和獠牙图(图7:1—3),此外,还有许多难以辨识的抽象和几何性的刻纹。而这些礼器上的獠牙图形状,在观察自然界的形状后可得知,最近似于野猪的獠牙。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推论:高庙猎民曾有崇拜野猪的信仰,而埋葬猪头的祭祀坑与獠牙图则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这种獠牙的象征图,在长江流域到青铜早期时代在礼器上依然颇为常见。在良渚的神圣造型上,有一个极少有人注意的共通特点:在神人像的腿间有两对獠牙,这与高庙礼器上的獠牙图相当雷同(图8:3)。学者们已屡次讨论关于高庙白陶器上的八角星图案,与长江下游通见八角星图案的相似程度^②,显然,古代长江乃是一个精神文化的传播通道,促使了象征獠牙形象的信仰以及良渚的天神造型信仰互相联结起来,并形成由多元文化要素所构成之大神形貌。(有关良渚崇拜对象之形象分析,以及相关信仰的内容,因超过了这次研究的主题,故笔者计划将于日后另著专文以进一步讨论之。)

在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国文明亦出土了几件带獠牙的神人面像礼器(图8:1)。循着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势力而逐渐扩展,使得这种造型从长江上游到山东都历历可见,如很多学者认为:日照龙山遗址出土玉圭的刻纹来源,与石家河有关,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带神面纹玉圭,也是渊源自石家河文明的礼器之一(图8:2)^③。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源自石家河的獠牙玉人面像(图10:2—5),在商周墓也曾出土过(图9:3;10:1),同时,考古学者在殷商时期的吴城遗址中,亦发现了同类的獠牙人面像(图9:2),这显示该传统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很高。

不过,如果我们将从高庙以降所传之獠牙图,都视为对野猪崇拜的脉络,那么将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何在与此同一时期中,却不见大量神豕形的礼器出土?长江流域新石器中期的河姆渡文化,礼器中确有蕴含神性意义的家猪造型以及小型家猪陶制品出土^④,但明显曾有崇拜野猪痕迹的地区范围,却均以湖南山区和丘陵地区为主。到

① 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蚌壳,因此,松溪口遗址简报的执笔者猜测:蚌壳的摆置或许是具有规律的,并怀疑可能类似于西水坡遗址那样,以蚌壳组成猛虎的造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顺东、贺刚:《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第6页,图五),但其他参与具体发掘的人员却认为,简报上的图样过于牵强,该资料恐怕并不可靠。

② 如参贺刚、陈利文:《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第51~60、92页。

③ 如参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第19页;王劲:《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江汉文明》,何介钧主编:《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邓淑萍:《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六)——饰有弦纹的玉器》,《故宫文物月刊》第11卷第10期,1994年,第82~91页;[日]林巳奈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台北:艺术图书公司,2010年,第232~243页;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第51~59页。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4页,图三三:7;第67页,图四一:1。

了青铜器早期,石家河祭祀坛上出土的许多小型陶制动物中,也有家猪的存在^①,但野猪造型的礼器在目前而言,并没有较多发现,仅有一件野猪形器,乃湖南湘潭县出土大约殷商时期的铜豕尊(图 11:1)^②,也因此凸显出其宝贵之处。此外,只有时代更晚的极少数几件文物,如山西曲沃出土的西周早期晋仲卫父盃上的野猪造型,其器身形状、纹饰与铜豕尊的野猪形象雷同,但是尺寸很小,并非整个独立的铜尊,而仅有盃盖上的盖耳属于野猪造型,盃身则有两层双凤饕餮纹(图 12)^③。晋国高层贵族墓里出土的两周礼器中,很多都带有南方风格,该铜盃以及晋侯 113 号墓出土的猪尊,皆应与湘潭县的豕尊具有传承关系。

换言之,江南山丘自自古以来便系先民狩猎活动之区,从此地区的发掘成果来看,可见自新石器早期便已有崇拜野猪的习俗。不过我们亦可以发现,江南山丘同时也是自古以来崇拜猛虎族群的活动地区。笔者经过不同礼器的相互对照,注意到两件相同时代的礼器,其构图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吴城文明江西新干遗址出土的伏鸟双尾虎,以及湘潭县出土的铜豕尊,两者之间相似性极高。此两件礼器的身上皆有夔纹、背盖上伏鸟、两耳竖立、四肢粗壮、尾下垂,且獠牙是外露的(图 13)。

在长江、两湖地区,老虎形的礼器出现数量颇多,造型风格都十分接近,如大约在殷商时期的江西礼器青铜器(图 2;3);湖南所发现的虎食人卣(图 14;21:1)、虎纹铜钺(图 17)、四虎铜罍(图 15)等。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了形状相似的四虎铜罍(图 16)。曾在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太保方鼎,似乎也具有南方礼器的风格(图 18);时代相近的虢季方鼎的双虎器耳的形状亦相近(图 19)^④。荆州江北农场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尊,也保留了商时代江南虎形器之特点:长开口、獠牙外露而立,但这种虎尊的形状属于进一步混合折衷风格的造型,獠牙猛虎的脚作成马蹄的形状(图 11:2)。

湘潭县出土豕尊的造型,相当符合江、湖地区虎形器的文化传统脉络。依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古代对野猪的崇拜和对老虎的崇拜,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互相结合。我们在礼器的传承演化中,基本上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老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此种现象呢?

笔者推论:不再崇拜野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猪的驯化使得人们对野猪之类肉食来源依赖度下降,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野猪作为必须狩猎、搏斗的对象,以及其所有的恐怖敌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217 页,图一六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195 页,图一五八等。

②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据笔者自摄照片。

③ 山西省博物馆收藏,据笔者自摄照片。

④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5,《西周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图七。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布伦戴奇藏品(B60B954)(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

兽形象消退了。同时,老虎作为山林主宰的形象则更加地被突显出来。山区猎民到了新石器晚期,基本上也脱离了游猎的生活方式,到处可见将驯养作为获取肉食主要来源的策略,而狩猎则相对地次要化了。我们从两湖山丘地带遗址的情况可知,这里的人群已基本上开始定居,从事驯养、渔猎和制造石器的行业。新石器晚期很多山丘遗址亦开始专业化,成为石器制作坊,与平原居民进行交易。他们狩猎活动虽然依然不少,但对生计的重要性逐步退化,其活动的本身反而强化了统治者获得权威性的“掌握”领土、资源、权力之意,猎获主要也用在大的祭祀典礼或是具有政权意义的活动里,较少作为日常的食物。

至于老虎的形象,对当时出去狩猎的人们而言,老虎并非肉食来源的狩猎对象,其中潜藏的更多意义,则是作为一个在山林地带间的竞争对手,同时老虎本身亦是崇高万能的狩猎者。因为老虎乃是在古人从事狩猎、接触自然界时,所认识的最强猛兽,因此进而神化了它。也因为这个缘故,江南山地的猎兵崇拜老虎并追求学习、获得它的崇高力量,以超越老虎而确认自己的崇高权威。并且,崇拜老虎信仰还具有一种关键意义:老虎是森林主宰、山地之王,能够与老虎合为一体的人,即是崇高的巫师,自己便能够成为自然界的神王,在山顶上,也就是最高的境界上,掌握崇高生命的权力。

上述时代与观念的变化,演变到后来,使得对野猪的崇拜往往次于对老虎的崇拜,也因此,獠牙的造型逐步开始被理解为“虎口”。(今日所谓之犬齿,在传统中常通称为“虎牙”。)从诸多礼器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出,先民的心目中,虎口的形象更近似于其他农耕先民所强调的“龙嘴”,亦成为了一种概念性的神化通道。

石家河晚期文化出土的部分神面像中的獠牙,已不甚似于野猪獠牙,其露出的牙齿比起过去更加接近虎口的形状。可见当时的野猪崇拜应已失去了其重要性,取而代之的,则是对老虎的崇拜更加兴盛。并且从高庙兽骨和松溪口白陶刻纹来看,这种转换应该在高庙文化就已经发生了。在此之后,石家河文明晚期阶段(或所谓的“后石家河”阶段)突然出现了很多玉器,其中老虎和獠牙面像的造型图显得特别多。以笔者浅见,这或许可以视为:高庙文化的后裔山地族群,从山脉而下来至江汉,并可能取得了统治者的身份。过了几百年后,在三星堆和吴城文化的礼器上,我们依然可见到这种獠牙面像,除了前文所提的玉制面像外,吴城铜制面像的牙齿形状亦如此(图 20:3)^①

吴城文明新干遗址中,出土了殷商时期的獠牙铜钺。大抵上来说,中原最常见的铜钺造型是龙张开口,或双龙、双虎饕餮的构图(图 20:1—2),以表达用钺斩首时,饕餮吞噬人牲,接受神杀祭礼,而将祭牲送回天上之意。但新干出土的铜钺却仅露齿咧嘴,并无饕餮的结构(图 20:4)^②。依笔者浅见,新干铜钺的獠牙即是虎口,尤其是其牙齿形状与新干出土铜虎的牙齿相同,在吴城文化信仰中,此“虎口”便象征了虎神吞噬人牲的信仰。

^① 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青铜王国:江西新干出土青铜艺术》,香港:两木出版社,1994年,图 20。

^② 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青铜王国:江西新干出土青铜艺术》,图 52。

在战国、汉代的文献中,“虎口”譬喻著极危险的境遇,如《战国策·齐策三》曰:“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史记·叔孙通传》载:“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①但对崇拜神虎的古人而言,被神兽吞食的人经过此一神秘过程,便可获得它的神力及保护。李学勤先生推断:“吞食象征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合一。……虎食人或龙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的合一,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解释。”^②此说法无疑是准确的。中国青铜文明对夔龙、饕餮或对神虎的崇拜,都是以龙口或虎口的吞食—神化功能为信仰核心。

大约在殷商时代,南方文明对虎神崇拜的造型刻划,已很明显地描绘出虎神吞噬人类的核心信仰传统。湖南宁乡出土的两件虎食人卣,其上的神虎造型也是做露出虎牙、啃咬人头之状,安徽阜南县朱寨镇和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造型,其蕴含之意也是相同的(图 21:1—3)。本信仰的范围包含西南之雪峰、武陵、大巴山脉,又跨到湘赣之罗霄山脉和湘粤桂之五岭山脉。依笔者浅见,这或许都属于传承自江南山岭一带对老虎的崇拜信仰,并同时将虎神的形貌与平原地带龙形饕餮的形象连接起来。老虎吞噬人头的图案亦可在弗瑞尔艺廊收藏的玉长刀上见到,本玉刀被视为相当于石家河时期的遗物,但可惜没有发掘资料,因此我们不清楚它的断代和出处,不过,其刻纹的技术与风格,确实是符合石家河及龙山时代的(图 9:1)。^③

在南方礼器中,饕餮形的“二虎共首”或夔纹虎神,都表现出正在吞噬人或咬断人头的形象。一直以来,学界对于虎食人构图的代表意义讨论不辍,张光直先生认为:人头放在猛兽嘴里,并不等于被吃;猛兽只是抱人,而这人的身份可能是巫师,猛兽抱着他嘘气放风,可帮助巫师通天。^④但这种观点恐不符合古人对猛兽的认识,如果人头在老虎的牙齿之间,岂能有不被咬杀的可能性?但这种咬杀在当时信仰观念中,却是带有着进入永生神秘入口的意义。

福莱瑟先生(Douglas Fraser)则将虎食人卣联系到西北美洲原住民[阿留申人(Aleut)或爱斯基摩人(Eskimos)]的萨满雕刻(图 20:4、5),以及印尼苏门答腊

① (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89页; (汉)司马迁撰, [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085页。

② 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③ [日]林已奈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第234页。

④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33页;另参施劲松:《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考古》1998年第3期,第56~63页;卢昉:《论商代及西周“人虎母题”青铜器的内涵及流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Sumatera)巴塔克人(Batak)的短剑象牙柄端的雕刻(图 20:6)^①。被神兽吞食的人经过此神秘过程,便可获得它的神力及保护。从礼器的结构来看,美洲和印尼的偶像,有可能是源自江南的巫觋文化。

甲骨金文中,除了从“虎”、“虍”的地名和难以考证的族名之外,还有从“虎”、“虍”的社会团体和政权结构,其涵盖属性也颇为多元;既有殷商王族族团的虎族,亦有殷商侯国的虎侯,又有虎名或从“虍”名的殷周境外的国家。笔者依然以为,族名或国名与老虎有关系,表达该族群或社会对自己的认识,并涉及崇拜习俗和精神文化。了解这些族群的发祥地和国家的地望,能助于理解对老虎信仰多元的发祥地和内在意义。因此下文拟进一步讨论,商代时期虎名的社会团体和政权结构之地。

欲讨论殷商文明对老虎的观念,除了礼器之外,甲骨文也是了解老虎在文化中意义的重要材料。殷商的甲骨文,虽然大部分代表着殷商王族的活动记录,但从甲骨卜辞所提及有关老虎的叙述中,应该还是可以看出其文化多元的面貌。

在甲骨文中,“虎”字的出现率偏高。虽然很多卜辞是残缺或意义不明的,但基本上却依然可以被归为两大类:狩猎或向老虎猛兽等神兽咒祷,以借其神力;以及“虎”字被用作地名、族名和国名的记录。殷商时期有几个以虎为名的国家,与殷商处于敌对或联盟的关系。其中之一便是虎方,在所有殷商时期以虎为名的国家中,它的历史最为悠久,且所在的位置无一不是在南方。因此下文拟从虎方的地望问题,加以思考江南崇拜老虎族群的历史。

二、虎方之地望考

虎方的记录最早出现在武丁晚期的卜辞里,即与殷商虎族和虎侯的记录年代相近,但是虎方是商王国边疆之外的另一国家,提及虎方的卜辞如下:

□□卜,争贞:伐,衣于……隹王?十一月。

……贞:令望乘暨途虎方?十一月。

……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虎方?十一月。

《合集》6667

^① Douglas Fraser, “Early Chinese Artistic Influences in Melanesia?”,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a symposium arrang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August 21—25, 1967, edited by Noel Barnard in collaboration with Douglas Fraser, New York: 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1972, v. III, pp. 631~654, ill. 14~16.

笔者不认为,“途”字宜读为“除”^①,所以卜辞的意思是:十一月王令望乘暨纛行到虎方。这应该是军事旅行,占卜了军事的胜败,并祈求祖先支持保佑、卜问可否出兵。

有关虎方地望问题,学界一致认为其位于殷商边疆以南,但具体的看法却有分歧。其中,丁山、岛邦男、钟柏生先生认为这是淮南地区的古国,或是周代所谓的淮夷之国^②;孙亚冰和林欢先生则认为:“虎方在今汉水以北,安陆、京山以南的地区。”^③彭明瀚先生认为:“虎方的地望定在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④而吴志刚先生则更确定地将之连接到吴城文化:“虎形象作为装饰艺术母题是吴城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除显然有某种特殊含义的伏鸟双尾虎外,新干大洋洲出土有虎形象的鼎达13件之多。吴城也出土过8件卧虎耳圆腹鼎。这在其他考古文化中都是少有的现象。能在重要礼器‘鼎’上广泛饰虎,显然虎的形象对吴城文化的族群有特殊意义。”^⑤

甲骨文中的虎方记载仅见于武丁时代《合集》6667卜骨上。不过,北宋重和戊戌岁时在湖北安州孝感县曾出土了西周早期中方鼎,在其铭文上亦有提到虎方,其文言曰:

隹(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国)。^⑥

中方鼎的年代由马承源示为昭王时期^⑦,此断代基本上无误。武丁时代虎方的“虎”字写成“𧈧”,而中方鼎虎方的“虎”字写成“𧈧”。虽然陈梦家先生提出字形有所差异:“与西周金文南宫中鼎‘伐反虎方’之虎不同。”^⑧但学界均不认为此细微的差异牵涉到古国之别。

无论是武丁卜辞还是中方鼎的铭文,都显示虎方的位置在商、周国家以南。像西周铭文以“某方”指称的例子很少,除了虎方之外,另有一例是鬼方^⑨,然而这二方国都见于商的甲骨文中,应该是西周沿用商代的指称。

孙亚冰和林欢先生认为,既然中方鼎出土在孝感,那么虎方的位置应离孝感不远,或

① 参郭静云:《由商周文字论“道”的本义》,《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203~226页。

② 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台北:大通书局,1971年,第150页;[日]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04页;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223页。

③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商代史·卷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36页。

④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1~108页。

⑤ 吴志刚:《吴城文化族属源流考辨》,《四川文物》2011年第1期,第50~58页。

⑥ 《集成》器号2751,藏处不明。

⑦ 《铭文选》器号107。

⑧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290页。

⑨ 如参西周早期小孟鼎有“𧈧(鬼)方子”(《集成》器号2839,藏处不明);春秋早期梁伯戈有“鬼方𧈧(蛮)”(《集成》器号11346,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随州羊子山附近,不可能到湘江、赣江之远^①。但这种理论较为薄弱,因在孝感出土铭文上的记录,未必就只能诉说距离出土地点范围很窄的情况,甲骨文显示:殷周时期战争实际发生的距离未必那么近。因此,当时掌握汉北地区的周室贵族,可能有意图往外扩展自己的影响或掌握一些江南资源,亦有可能当时的商周政权需面对南方势力往北扩展,故而得采取某些防守措施。铭文说“伐反”的用词,可能代表当时的汉北地区正是南北势力的战线区,南方政权往北扩展势力,而周伐反,要固定、加强自己势力的南疆。

从空间的关系来看,从汉北地区到洞庭湖和鄱阳地区的距离相同、路途便利,因此彭明瀚先生所提出的范围,符合中方鼎的出土情况。在武丁晚期,商的领土范围应该最宽,以笔者浅见可能以汉江为西南境。位置接近汉口的盘龙城宫殿区,在第六、七期之间出现毁灭的痕迹,恰好相当于武丁时代,很可能与《诗·商颂·殷武》所言“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有关^②。而且,盘龙城被毁灭后,第七期恰好出现了很多北方的兵器等遗物,有可能与北来的殷人有关。是故,笔者认为,武丁晚期殷人掌握的领土到达汉口,而虎方国地理位置在此之南,是为江南。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假设:第一是虎方位于湘江流域,曾经在岳阳、长沙宁乡、邵东县出土的青铜器(包括虎食人卣、四虎铜罍、虎纹铜钺等,图14—17)属于虎方国的礼器。第二是虎方位于赣江流域,吴城文化即是原称为“虎方”的古国网络。虎形的大礼器,实可以是为古国命名为“虎”的指标。宁乡虎食人卣揭示了崇高虎神为当时当地身份极高的神兽。荆州江北农场出土的西周早期虎尊(图11:2)也可以视为同一文化脉络的礼器,出土的地理范围也相符。虽然在吴城遗址出土的虎形礼器可以表达一个系统(图2;3;13:2),但湖南零散出土的虎形器不比江西少或差。

此外,笔者认为,虎方此一国家文明的发祥地究竟为何的问题,可能离不开早期华南地区拜虎信仰的发祥地。从新石器以来,虎形的礼器普遍出现在两湖地区,并且,考古资料显示其来源乃是位于湖南山林地带以高庙为代表的文化;不过与此同时,凌家滩的虎形礼器亦说明了一件事:神虎的形象早已跨过了罗霄山脉,而从雪峰山脉、武陵山脉、南岭扩到怀玉山、潜山山脉等范围广大的江南地区。因此,虽然从原始的发祥地来看,湖南似乎较为符合虎方所在之地的条件,但到了青铜早期时代,江西地区一样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认定虎方就是位于这两地的其中之一,而仅能期待更多商周时期的地下材料出土,好让我们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商周时代江南地区不属商周的古国文明。

从吴城地望来说,新干离汉口距离较远,但顺着赣江,新干到九江的地区,可能都是古吴城文化网络。另外,汉口和吴城地区之间恰好有颇为关键的金属矿,对殷室和周室来说,掌握金属矿的可能性无疑值得发动战争。从殷周发动战争目的来看,往洞庭湖湘江的战争,可能多有一些中方鼎所录“反伐”的意义,即掌握汉口核心据点,以及掌握一些其他资源。往鄱阳湖赣江的战争,虽不大可能涉及“反伐”,但会有掌握金属矿的关键动机。换

①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第434~437页。

② (汉)毛公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第2216~2217页。

言之,从目前资料来看,洞庭湖湘江和鄱阳湖赣江,两地都有可能是虎方所在之地。

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古文字的线索,但此条线索依然仅能指出湖南和江西两个地方,而不能帮我们两者之间做优势的选择。在古文字中,“吴”、“虞”两个字混用,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虞”字即是从“吴”、“虎”,而“吴”和“虎”又是同音字,所以从古文字的角度来说,这三字的关系颇密切,或能补证支持虎方为吴城的假设。“吴”和“虞”互相假借用,在传世和出土文献中,都属于常见的情况,如西周中期同簋^①、免簋^②、西周晚期四十二和四十三年逯鼎、逯盘、逯钟^③、吴王姬鼎^④,都把“虞”写成“吴”,春秋时期吴国的吴王夫差盃,也将“吴”字当“虞”来用^⑤,传世文献中的文例也极多^⑥。

在殷商和西周早期铭文中,曾发现数件吴主的器物均用“吴”字,如殷商时期吴鼎^⑦、吴父癸鼎^⑧;西周早期吴盃^⑨、吴盘^⑩等,此外,班簋铭文有提:“王令吴白(伯)”的事情^⑪。至于虞主的青铜器,则最突显的是西周早期虞侯矢簋,其铭文先提“王令虞侯矢”,在后虞侯矢“乍(作)虞公父丁尊彝”^⑫。该铭文表达,虞是周的诸侯国,同时虞侯的祖先也是本地首领虞公。虞侯尊簋出土地在江苏镇江丹徒区大港街道的赵魏村烟墩,此地点位于长江的南岸,并非位于前文中所提及的地理范围里,反而更加偏东北,但此地自新石器晚期以来就属于长江中游和下游文化交界之区,也是吴国文化的东北角。铭文以虞自称的侯,表达他认同和周王室的同盟及封建关系,但资料没有阐明虞侯世家的背景,且早期虞侯国的范围又不甚清楚,因此我们也不能肯定,虞侯矢簋出土的地点能代表其侯国的地望,所以一切资料仅供为讨论,不能定论。

传世文献也有供以思考的线索,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言:

① 《集成》器号 4270—4271,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② 《集成》器号 4626,藏处不明。

③ 《新彙编》器号 745—757、772—774,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陕西省眉县文化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④ 《新彙编》器号 1757,现藏于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中心。

⑤ 《新彙编》器号 1475,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⑥ 传世文献则参高亨,《古字通假会典》,第 853 页。

⑦ 《集成》器号 996—997,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⑧ 《新彙编》器号 1936,藏处不明。

⑨ 《集成》器号 9407,藏处不明。

⑩ 《集成》器号 10066,藏处不明。

⑪ 《集成》器号 4341,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在西周封建制度里,“伯”属于周国官制系统的爵位,但在殷商时期,“伯”反而代表着非殷商王室宗族的本土首领。在西周早期的铭文中,这两种可能性皆有之:吴伯或许是王室所派遣,并由周王分封到吴地,以统领吴地军队的将军;但也可能是吴地原有的统治者,由于接受和周室的联盟,因此周王拥有号令他的权力。同时,班簋铭文所载与周王有关系的“吴伯”,则未必是吴城范围的贵族。这些问题牵涉到难以解决的同名情况。不过,这几件青铜器的出土地点虽然不明,但班簋的器形确实接近于南方的器物。

⑫ 《集成》器号 4320,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①

司马迁所载的传说，或许与虞侯矢簋的铭文所表达的事情相关，即显示出西周中期周和吴的关系；或在古代吴城的北疆上，周王室建设了吴（虞）侯国，以南、北之“虞”的分别，画上了周室影响范围的南北之线；又或者，春秋时期晋吴之间的关系，即奠基于此背景之上。

不过，传世文献的记录也使我们怀疑：不只有一个古国以虞为国名，且年代早晚之间有许多变数。后期传世文献载有西虞、东虞等数国。如《管子·小匡》曰：“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桓公曰：‘呈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柯、磬、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于此乎？’”尹知章注：“西虞，国名。”^②《穆天子传》言：“十虞：东虞曰兔台，西虞曰栢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来，十虞所。……天子命之为柙而畜之东虞，是为虎牢。（‘虞’张耘先生改作‘號’）”^③东、南、西、北虞地的记录似乎表示国疆的概念。以上使笔者推想一个问题：此与护疆的虎神信仰是否有关系？文献记载零散，涵盖许多时间上的变数，所以该问题难以回答。在后来的文献中，也出现很多同名的地名，以及从“虎”的“號”与“虞”的混淆等，这些问题更造成了许多地望无法辨认的情况。

“虎”和“虞”的关联性，同时亦能是支持虎方为湘江流域的假设之原因，是在传世文献中，“虞”为舜帝的朝号，而舜又被称为湘君，指涉湘江的地域范围。虽然在后期传世文献皆把舜的活动地解释成河南、山西地区，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情况隐藏着后期神话遭到人为修改，以及涉及殷周以来统治中心位于黄河流域的因素，所以记载过去历史时便把殷周以来的统治中心连接到记录者的国家中心。从文献中所透露出的，少数和正统历史不相符的痕迹，包括舜为湘君的说法也在内，可能都恰好保留原来的传说意义。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正义》引《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兴县东南一百里。皇览冢墓记云舜冢在零

① （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第523～524页。

② （春秋齐）管仲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25～426页。

③ 张耘点校：《山海经·穆天子传》，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232～237页。